

邢海洋《氣候、地理與古代的我們》1

邢海洋在《氣候、地理與古代的我們》中，以運城鹽湖為起點，探討地理環境如何形塑中華文明。邢海洋畢業於北京大學地理系，曾長期撰寫經濟專欄。這部書以現代氣候科學為工具，還原古人腳下那片土地的真實面貌。

汾渭地裂谷從內蒙古高原一路撕開，抵秦嶺腳下，盆地從北到南串珠式排列。裂谷北端是泥河灣古人類遺址群，兩百萬年的石器地層層層疊壓；裂谷南端是運城盆地，氣候更為溫暖，汾河黃河帶來肥厚土壤，運城鹽湖是中原腹地絕無僅有的鹽倉。邢海洋稱之為運城盆地的「神助攻」：中原腹地再也找不到第二處天然鹽源。

黃河從晉陝峽谷衝出，在華北大平原上泛濫、改道、堆積，把泥濘的灘塗沖積成沃野。司馬遷所言「昔三代之居，皆在河洛之間」，夏商周先民沿著黃河出山口附近這條狹窄地帶繁衍生息，運城盆地正是這條文明鏈條的源頭。

四百毫米等降水量線斜穿中國版圖，從大興安嶺綿延至喜馬拉雅東部。線的東南半壁，森林、農耕、人煙稠密；線的西北半壁，草原、遊牧、人煙稀疏。沿著這條線，戰國時期中原人開始築牆，秦始皇把斷裂的牆體連成一體，明朝再加固。牆的兩側，兩種生存邏輯互相碾壓，催生了兩千年刀兵相見的歷史。

鹽結晶，鹽湖，裂谷，等降水線。長城以東以南，黃土堆積成大陸，運城鹽析出於盆地，中華文明就在這片溫暖濕潤、被太行山與秦嶺護佑的土地上醞釀。剝去道德外衣，剝去王朝興衰的史觀，剩下的只是水、土、鹽和氣溫。地理環境才是決定文明走向的根本因素。

書名：氣候、地理與古代的我們

作者：邢海洋

出版社：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

邢海洋《氣候、地理與古代的我們》2

1492 年，哥倫布抵達加勒比海。所有人都以為，這是美洲厄運的起點。事實上，一萬五千年前，現代智人踏過白令陸橋時，美洲文明的劣勢便已形成。

兩百六十萬年前，稱為真馬的古物種從北美洲出發，越過同一條陸橋，踏上亞洲的凍土。這是第四紀冰期的標誌性事件，也是邢海洋在《氣候、地理與古代的我們》反覆追問的起點。書中寫道：「一群馬，一族人，相距二百五十餘萬年，給這個變亂的氣候時代帶來了獨特的生機。」

馬從北美去了亞洲，繁衍成無數族群；人從亞洲去了北美，帶來石矛與火。一萬五千年內，美洲的馬、劍齒虎等大型哺乳動物被屠殺殆盡，剩下北美野牛等桀驁不馴的動物，新石器時代的印第安人祖先再也找不到可以馴化的對象。這是結構上的劣勢。

氣候帶、植被帶、農耕帶沿著相似緯度延展，麥子從中東傳入歐洲只需數千年，馬匹從中亞傳入西歐只需數百年，車輪、犁具沿著相同溫度的走廊暢通無阻。美洲南北縱貫，從北極凍土到赤道雨林，每跨越一個緯度就是一道鎖死的天險，玉米無法從墨西哥北上到加拿大，馬匹無法從安第斯山脈傳到北美大平原。

當歐洲人駕著帆船再次「發現」新大陸，印第安人手裡沒有馬，沒有輪子，沒有犁，沒有對抗歐亞病菌的免疫記憶。地理條件的差距，補上了致命一刀。剝去「文明對野蠻」的道德外衣，剩下的不過是緯度與經度的差別。

書名：氣候、地理與古代的我們

作者：邢海洋

出版社：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

邢海洋《氣候、地理與古代的我們》3

邢海洋在《氣候、地理與古代的我們》中把氣溫攤開來，唐朝末年、五代十國前期、元明之交、明朝末年，亞洲季風降水大減。

遊牧民族南下的馬蹄聲裡，沒有掠奪的狂喜，只有凍僵的手指和哭啞的嬰兒。馬背上的人在零下三十度的風雪裡找不到可以放牧的草場，部落的牛羊在飢餓中倒下，孩子凍死在帳篷裡。向南走，是草場枯竭之後純粹的生存本能。草場枯了，南邊的牆必須撞開，農耕與遊牧的碰撞就此啟動。書中寫得透徹：「原始人不是喜愛自找苦吃的族群」，南下是被氣候推著走的。

氣候不僅壓迫遊牧者，也幾乎抹掉過整個人類種群。第四紀冰期撕開來看，寒冷只是表層，冷熱反覆搖擺才是最致命的部分。約九十餘萬年前，一次極端氣候事件讓人類從十萬餘人驟降到千餘人，瀕臨滅絕。九十萬年的時間跨度，百分之九十八的人口蒸發，只剩殘燈一盞。

冷下來，南方溫暖的盆地擠滿了避寒的部族，舊秩序被碾成粉，新的帝國從凍土裡長出來；暖起來，冰蓋退卻，海平面上升五十米，良渚水城被淹沒，文明曙光被海潮吞掉。氣溫每偏移一個刻度，文明的疆界就跟著畫一條新線。

書名：氣候、地理與古代的我們

作者：邢海洋

出版社：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

費維愷《中國早期工業化》1

美國漢學家費維愷在《中國早期工業化：盛宣懷和官督商辦企業》中，仔細審視了晚清官督商辦體制。他選擇盛宣懷作為切入點，因為此人集中體現了儒家官僚在新式工業中的結構性困境。

盛宣懷的一生，是雙重身分的撕扯。1844 年生於江蘇常州官紳家庭，1870 年進入李鴻章幕府，依附淮軍體系崛起。輪船招商局、電報總局、漢陽鐵廠、華盛紡織總廠、中國通商銀行，晚清最顯赫的工業版圖背後都刻著他的名字。費維愷引入「企業家功能」的概念，質問晚清為何缺乏推動經濟變革的充足動力。盛宣懷的軌跡恰好提供了反面教材：他的經營才能依附於官僚地位，官僚地位又依附於李鴻章的庇護網，一旦庇護網鬆動，所有企業都將失去根基。

費維愷注意到，盛宣懷的子孫編寫的傳記「幾乎沒有關於盛的私人財務和經營活動的資料」。在當年的價值觀中，「即使是一個小官，他的威望也遠遠超過任何工商業活動」。傳統的士農工商階級觀念，把工業家壓成官僚的附庸。盛宣懷可以被稱為「辦大事之人」，但絕不可能成為純粹的商人。

盛宣懷既不能脫離國家體制獨立運作，也無法與工商活動保持距離。他始終嵌在官僚體制之內，進退不得。費維愷指出：中國的傳統社會無法適應現代世界的要求，制度上和思想上的障礙鎖死了工業化的通道。盛宣懷就站在那條被鎖死的通道盡頭，手握輪船、電報、鋼鐵的藍圖，腳下卻沒有一寸屬於自己的土地。

書名：中國早期工業化：盛宣懷和官督商辦企業
作者：費維愷
出版社：中國社會科學院

費維愷《中國早期工業化》2

「官督商辦」這四個字被教科書寫成了溫和的折衷方案，官保護、商經營，各取所長。費維愷在《中國早期工業化》中拆開了這層包裝。商股出錢，官僚掌權，激勵機制從運作初期便存在結構性缺陷。這套體制沒有法定地位，沒有法律保障，股東無法依據任何商法反對官僚的勒索。

以輪船招商局為例。李鴻章 1872 年把 13500 兩銀子存於新組建的招商局，這筆款項原是直隸省的練餉。官方資本以「存款」面貌進入，商股以「官利」面貌被吸引。所謂官利，是在損益賬起草之前先從總收入中扣除的保證股息，年息常在百分之八到百分之十之間。企業虧損了，官利就從股金或借款中提出。會辦們一律擁有官銜，由李鴻章按照盛宣懷的推薦任命。1891 年增添的三個商董同樣由李鴻章指定。名義上「三個官員和三個商人」共同管理，實際上六人之中僅有一位不是官方任命者。

費維愷點出了其中的悖論。公司屢屢陷入經濟困境，向官方呼籲援助，經理們的私人財富卻不斷膨脹。股東的錢流入公司的虧損黑洞，經理的口袋卻日益飽滿。《中國早期工業化》記錄的制度缺陷，每一條都能在今天的商業版圖中找到共通點。只要權力與資本的邊界仍然模糊，只要經營者的任免仍然取決於行政指令而非股東意志，官督商辦的體制缺陷就會持續影響現代商業運作。

書名：中國早期工業化：盛宣懷和官督商辦企業

作者：費維愷

出版社：中國社會科學院